

【国家理论】

现代民族国家前途的 三大影响因素及其关系

于春洋 周佳薇

【摘要】民族国家是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现代国家形式。审视现代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可以发现,全球化是民族国家置身其中的时空场域,国家认同是维系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底层逻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则是民族国家实现存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分析表明,全球化在削弱国家认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在保有和增进国家认同,而“民族认同国家”的状况则决定着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化在展现复杂特性的同时,并未改变其挑战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趋势,还在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制造新的不平等;无论从强度还是层次上看,依然存在很多影响国家认同状况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系统评估、慎重对待;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作为一种“慢变量”而发挥作用,其自身也面临一系列冲击和挑战。现代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与自身的持续性建构能力及其成效密不可分,也与外部世界的环境变迁及其剧烈程度息息相关,在偶然与必然、个性与共性、时间与空间的交互作用之下,展现其丰富的可能性。

【关键词】民族国家;全球化;国家认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

【作者简介】于春洋,教授;周佳薇,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秦皇岛 066004)。

【原文出处】《世界民族》(京),2024.2.27~4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文献整理及当代意义研究”(21&ZD211)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一个分析框架

民族国家是17世纪初起源于西欧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它在诞生后就逐步取代了以前的城邦国家、王朝国家以及部族国家等其他国家形态。学界普遍公认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民族国家正式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国家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组成单位,并逐步成为世界上最为基本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演进的基本形式,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然而,全球化(globalization)导致的全球市场、“空心国家”^①(hollow state)与全球文化等正在不断地弱化民族国家的权威边界,加之民族国家的内部建构并非总是卓有成效,作为民族国家合法性根

基的国家认同也正在遭受解构与冲击,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似乎需要重新审视。

若想理解当前阶段^②现代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有三个关键因素无法绕开。这三个因素分别是全球化、国家认同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如下页图1所示,可以将三个关键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用如下的结构图示来加以呈现。其中,全球化构成民族国家置身其中的时空场域,同时也给民族国家提出了诸多挑战;国家认同是维系民族国家合法性的重要底层逻辑,也因此成为民族国家存续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都会把保有和增进国家认同作为国家建设的核心战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则是拉近国内各民族之间心理距离、促进族际政治整

合、推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必要途径,在全球化叙事的当下境遇之中,也成为民族国家实现自身存续发展的根本解决方案。整体而言,全球化是作为一种削弱国家认同的力量而存在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则是在努力保有和增进国家认同,而“民族认同国家”的状况关乎民族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因此也就决定着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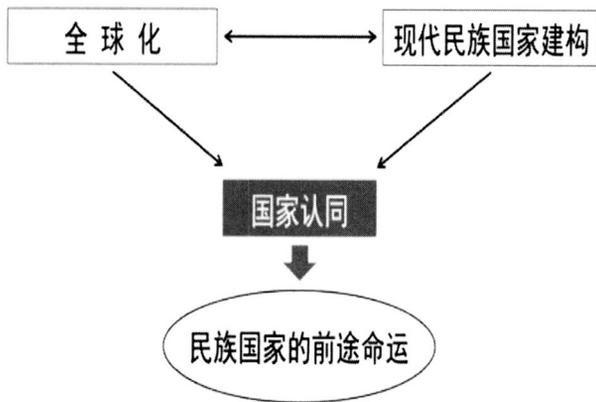


图1 影响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核心因素及其关系图示^③

本文拟从这一分析框架入手,在对影响当前阶段现代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主要因素——全球化、国家认同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行拆解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关于现代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初步结论。

二、作为理解民族国家前途命运叙事场景的全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迅速蔓延,世界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社会也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近年来,伴随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科技革命进程的加速,全球化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鉴于全球化构成了本文的叙事场景,而学界对于全球化的内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很有必要对于“全球化”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

(一)作为世界发展关键变量的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作为一个多维、复合的历史进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为标志的西方产业革命基本完成,极

大地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全球化逐具雏形。这一时期,全球化表现出“单向扩张”的特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相对传统落后的亚非国家进行资本扩张,并将自身政治体制、文化价值理念等向传统落后的国家进行灌输。由此,传统国家也被迫卷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之中。二战之后的全球化在世界科技进步的加持下继续发展,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剧变而形成势不可挡的浪潮席卷世界。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日益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图景。一方面是学界“逆全球化”^④“全球化退潮”^⑤“新型全球化”^⑥的声音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现实世界关于“全球化浪潮”的争论。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间带来巨大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同时,也因贫富分化加剧、跨国公司权力膨胀、民粹主义兴起等全球性危机使其自身的正面效益受到质疑。全球化是否已经走到一个拐点?现实情况是,当今世界依然保持着相互依赖的格局,“没有哪一个区域能做到自给自足”^⑦。在全球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与知识和技能相关的流动仍在推动全球互联。可以认为,全球化依然是理解当今世界政治秩序和发展趋势最具影响力的变量之一。由此,若想理解现代民族国家前途命运,不能缺少对于“全球化”的观察与把握。

(二)作为中外学界研究对象的全球化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提奥多尔·拉维特(Theodore Levitt)首次对全球化的概念进行阐述并赋予其经济层面的含义^⑧。随着全球化进程加深,学界对全球化理论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其对民族国家这一国家范式的冲击和影响,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局势。其一,“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与“本土化”(localization)共同构成“钟摆”运动的两端。罗曼·勒克莱尔(Romain Lecler)从社会学角度总结当代全球化的六个新“转向”^⑨;葛浩阳从“时间-空间”双重运动中认识到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替前行的双重潜质^⑩。这种“转向”或“交替前行”的倾向,既反映出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不断博弈的态势,也体现了现代民族

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存在着的日益复杂的困境。其二,全球化绝非单一的经济全球化,而是全面的全球化。对于全球化的范畴问题,有学者指出,“今后全球化的趋势将是科技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两大主流的汇合与交融更加密切、更富成效”^⑩。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化将客观世界与虚拟空间中的一切事物转化成数字,以实现“时空透明”^⑪,亦即全球流动内容的“精准化”。其三,全球化对推动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正面性”作用逐渐受到质疑。全球化在加速各国经济、政治、文化间互联互通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非法市场、领土冲突、国家动荡等威胁,消解了原本囿于民族国家分析框架之内的国家认同。全球化对现代民族国家存续发展的正向推动效应似乎正在消失。

综而观之,全球化的核心在于跨国性的交流、与世界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以及相互依赖。可以认为,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起点,并且会对包括政治、文化等范畴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全球化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协作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同时还冲击着各个主权国家的政治权威边界,影响着国家的政治行为。凡此种种,都对建立在“民族认同国家”基础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形态构成严峻挑战。

(三)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

全球化对现代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原生性民族国家的形成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是全球化的开端。早期带有侵略性质的全球化进程使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了民族国家的行列,民族国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国家范式。然而,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民族国家的局限性与脆弱性也逐渐凸显出来。

1. 经济层面:跨国公司、“价值链”与结构性失衡

全球化毫无疑问使世界诸多民族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有了质的飞跃。同时,全球化也加剧了发展

的不平衡、不充分。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以世贸组织、跨国公司等为代表的超国家层面或跨国家层面的经济组织得以成长和发展,极大推动了世界各国经济领域的合作和进步;另一方面,自由市场主导下的国际分工使“全球价值链”^⑫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发展落后的国家转移。对处于价值链下游的国家来说,全球化通过跨国公司等组织机构的设立缓解了国内的就业问题,但同时也在“扩大国内中产阶级与农村人口之间的现有差距”^⑬,进而影响国家的社会凝聚力和认同感。而对美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国际分工会加快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隐患。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即使一个国家的医院拥有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口罩(或其他个人防护设备)的短缺也会使医疗系统陷于瘫痪。不仅如此,新冠疫情暴露并且加剧了民族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并导致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呈现出一种K型复苏,其中上层继续表现良好,底层继续受苦”^⑭。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推进各民族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因其对某一或某些国家的过度依赖而造成相当多的民族国家内部经济结构失衡。

2. 政治层面:民粹主义、“脱钩”与合法性危机

全球化改变了以往政府监管“少即是好”的观点。各民族国家正在寻找“一套最低限度的合作规则”^⑮来达成国际合作共识并制定新的全球规范,以维护国家公共安全。与此同时,全球化导致的不平等问题正在诱发新的危机。其一,日益增长的经济不确定性以及“相对剥夺感”,被认为是近年来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以气候政策为例,西方右翼民粹主义(RWP)“将气候政策描述为一个‘世界主义精英’的项目,违背‘人民’的利益”^⑯,进而对其强烈批判;其二,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主权边界变得模糊,民族国家似乎正在丧失对主权的管控;其三,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全球化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程度的“脱钩”而非深层次的

整合;其四,全球化导致了“世界规则”的合法性危机。当前的世界规则是由美国西方少数几个大国参与制定的,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新兴大国对现有国际组织形式及其规则提出诸多质疑,而“全球游戏规则”的解构与重建势必对各民族国家前途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3. 文化层面:全球市场、价值输出与帝国主义

全球化改变了文化交流的方式以及文化产品流通的规模。既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文化交流,也使文化多样性面临威胁,进而挑战民族国家的认同根基。随着全球化的层次加深,“文化全球化”^⑧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既成事实。以色列学者雷格夫·莫蒂(Regev Motti)将这种文化现实定义为“文化世界主义”^⑨,并认为其没有带来文化同质性。事实上,“全球文化市场”中流通的文化产品并非没有价值观念的影射。以电影这一全球流通的文化产品为例,电影是表达国家民族文化的主要艺术形式,几乎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电影”。在这个意义上,伴随其在全球范围的传播而带来的价值输出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文化全球化是从“西方进步论”的视角来看的,文化产品的流通方向和规模仍然受到资本主义的调控和限制,文化帝国主义色彩昭然若揭。正如艾西利·梅纳德(Ashley E. Maynard)所批评的那样,“一种样式不能满足所有人”,把某个单一的“最佳”文化发展为普适概念,“已经不再是合理的”^⑩。

总的来说,全球化一方面使世界各国在发展时空意义上的差距不断缩小,另一方面也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提供正当理由。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互动和接触更加频繁,每个国家都成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协作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一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波动,会对他国乃至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这种现实正在加剧全球不平等,削弱国家的杠杆作用,不仅威胁民族国家的主权边界,也让民族国家未来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空前提升。

三、作为理解民族国家前途命运核心议题的国家认同

当前,我们正处于全球化叙事以更加深刻和复杂的样态全景呈现的时代。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叙事场景之中,正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全球化导致生活在民族国家之中的民族个体成员昔日牢固的国家认同出现了弱化和淡化趋向,从而危及民族国家的认同基础。鉴于国家认同构成了本文所研究的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又一关键变量,因此很有必要对“国家认同”的概念进行学术史梳理。

(一)“国家认同”研究在西方的兴起

“国家认同”顾名思义,就是将国家与认同结合起来,在国家的层面上讨论个体的身份认同问题。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小G. 宾厄姆·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首次将“国家认同”作为一个问题予以论述,并指出“国家的认同意识问题”是政治文化中“体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⑪从此,“国家认同”在政治文化理论研究范畴之中就占有了一席之地。学界对“国家认同”的普遍关注和研究,始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的问世。该书以“国家认同”为核心概念展开论述,直指超级大国——美国因为国家认同问题而使国家面临解体的危机^⑫。书中观点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学者对于“国家认同”问题的关注。近年来,有学者意识到国家认同是一种短期内易变的情感,“不能简单地基于任何地理领土、种族或宗教”^⑬来加以约束。无论如何,“国家认同”还将持续作为研究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相关议题的关键变量而存在。

(二)心理学与政治学视野中“国家认同”的含义

关于国家认同的含义,学术界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但大致可以从心理学视角和政治学视角对这些研究进行分类。立足于心理学视角的学者,大多认为国家认同是一种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可及心理归属的情感,且这种情感是可以建构的。比如,学者杨哈

旭认为提升国家认同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除了夯实物质基础,还需在集体心理认知层面消除既有的文化、意识形态及身份认同等偏见。^②袁明旭等则认为国家认同并非自发自然形成的,而是经过后天社会政治化形成的具有归属感、主观性等特质的情感。^③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立足于政治学的视角研究国家认同的含义,如石亚洲等认为国家认同包含“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认可”以及“对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两层含义^④。杨秦文认为,“现代国家认同之形成乃民族国家合法性逐步确立之过程”^⑤,即国家认同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正当性基础。

综观学者们的研究,我们认为国家认同是指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及历史背景下,国家内部个人或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对于民族国家所形成的归属感和忠诚度,进而产生的对于自身国民身份的认可。同时,国家认同也是国家内部公民对于自己国家的国家主权、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历史背景、文化内涵等方面的认可,是国家合法性基础和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所在。

(三)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根基与发展助推器

近年来,学界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国家认同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国家内部对本国的认同强度是民族国家能否拥有合法性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国家认同也直接影响着民族国家安全,并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民族国家就是建立在“民族认同国家”基础之上的国家。

1. 国家认同构成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来源与根基

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直接来源于人民权力的“让渡”,缺乏高度的国家认同,这种“让渡”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当民族认同国家时,才会通过社会契约而用自己的部分权力换取国家的保护,从而完成权力的“让渡”;另一方面,国家认同也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确定的边界。“国家需要连贯的边界,这是一个国家的行政、选举和分配能力的先决条件”^⑥,

也是区分“我们”和“他们”的依据。这种边界既包含实体的,又包含心理的。同时,国家认同不仅包含政治性国家认同,还包含文化性国家认同,这两种认同共同构成跨越两种边界的“入场券”^⑦。相比之下,那些“国家认同危机问题频发的国家中,该国的制度在某些方面缺乏正义性”^⑧。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来源与根基。

2. 国家认同有助于实现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国家认同作为民族国家的心理基础以及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能够对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起到助推器的作用。高度的国家认同会促使民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自觉地维护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如2022年意大利奢侈品品牌迪奥(Dior)抄袭中国传统华服“马面裙”事件发生后,“为了反对文化抄袭,大约50名中国学生于当年7月在巴黎迪奥商店外举行了抗议活动,并贴上了微博标签”^⑨。中国留学生的这一举动反映出国家认同在增强文化自信、抵御颜色革命层面中的关键作用。同时,国家认同也会对民族国家自身发展目标的确立、对外处理国际关系的战略选择以及国家所谋求国际地位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没有民族认同国家作为前提,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都将成为奢望。

3. 国家认同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下,国家认同是促进国际政治整合、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及国家濡化能力的关键因素。

第一,国家认同通过维系族际政治整合,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研究表明,族际政治整合可以巩固国家认同根基、培育国家认同主体、达成国家认同共识,^⑩其实良好的国家认同状况也可以反哺族际政治整合。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存在着多个民族,妥善处理国家认同与各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增进族际政治的整合。埃米·林德斯坦(Emmy Lindstam)指出,“同时认同国家身份并理解民族文化的个体更具有可塑性”^⑪。良好的国家认同状况,可以弥合“公民”与“族裔”(ethnic)两种认同之间

的缝隙,促进族际政治整合,为民族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基础。

第二,国家认同是提升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助推剂。其一,国家认同会影响政府的施政质量。高绩效政府可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和保持较低水平的贪污腐败,而能否成为高绩效政府,主要取决于政府人员能否保有较高的国家认同水平,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其二,国家认同是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举措。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觉得他们是大家庭的成员,并且彼此之间有高度的信任,他们就更有可能会支持帮助弱势群体的社会项目”^⑧;其三,国家认同是影响社会动员能力的重要因素。只有当民众对国家抱有高度的认同时,他们才会主动配合国家的调度和部署。

第三,国家认同是提升民族国家濡化能力的根本动力。“濡化”(enculturation)是当今民族国家治理的普遍趋势,其本质就是“国家通过各种‘润物细无声’的宣教方式……使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真正成为每一位社会公众的思维逻辑前提和自觉行动纲领”^⑨。而这种“濡化”是建立在较高水平的国家认同基础之上的。只有当民族国家为社会成员提供生存空间、平等权利与文化尊重等保障时,社会成员才会对国家形成广泛的信任与支持。这种信任与支持“是促进经济交流和政治参与的润滑剂”^⑩,也是国家提高濡化能力的底层逻辑。

总之,较高水平的国家认同构成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根基与发展助推器,国家认同的脆弱或缺失则是民族国家陷入各种危机的根源。“高度分裂的国家是弱小的”^⑪,脆弱的国家认同容易导致民族国家的分裂甚至战争,且分裂后的政治单位更难以抵御来自国内国际的危机。如西班牙最富有的地区——加泰罗尼亚一旦分离出去,不仅使该地区本身的前途命运复杂化,也会对西班牙经济、地缘政治、国际影响力等造成严重冲击。国家认同水平关乎民族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四、作为影响民族国家前途命运应对方案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

经验事实表明,正是通过民族国家建构,西欧各国才实现对于民族国家的初创;而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过程,其实也就是民族国家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被不断建构的过程。及至当下,面对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与复杂表象,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又是民族国家回应挑战,实现自身重构、自我发展与完善的重要途径。而那些没有能力通过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来实现民族国家的自我迭代与发展的,则被视为失败国家(failed state)或脆弱国家(fragile state)。由此可见,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及其成效,也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

(一)双重维度下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内涵

与民族国家包含“国家”和“民族”两个面向相对应,学界一般也从“国家建构”(state construction)和“民族建构”(nation construction)两个维度来讨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内涵问题。比如,英国学者丹尼尔·哈密特(Daniel Hammett)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既依赖于领土、边界和主权的交织,也依赖于‘国家身份观念的再生产’”^⑫;陈心香等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是重要且复杂的话题,且“是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的双重进程”^⑬;杨文帅认为民族国家建构有一定的特殊性,“包括‘民族建构’和‘民族-国家建构’两个部分”^⑭。

可以发现,学界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解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认为这一建构包含两个相互关联又彼此分立的方面,即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其中,国家建构属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外观建构,着重解决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法律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完善等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从而使民族国家在主权范围内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实现善治;民族建构则属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内核建构,旨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共同体,以此凝聚国家民族精神力量,实现民族对于国家的高水平认同。通过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让民族国家既具备现代国家的外观,又拥有

民族认同国家的内核,^④从而回应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实现民族国家的存续与发展。

(二)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建构及其对民族国家的影响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回应全球化挑战的系统解决方案,其主导者自然是民族国家。作为该方案的两个不同面向,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彼此关联、相互作用,统一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体系之中。

1. 国家建构: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外观的建构

国家建构既是一种解决国家脆弱性的方案,又是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手段。一方面,国家建构通过提高国家的控制、监管和执行能力,特别是提升法治和政府的合法性等,维系民族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如沃尔克·博吉(Volker Boege)等人所言,“不同程度的国家脆弱性或不同阶段的国家崩溃的现象正在增加,一般建议的解决方案是‘国家建构’”^⑤。特别是那些面临政治衰朽与经济崩溃的国家,国家建构成为其首要任务。倘若国家建构未能取得成效,这些国家就会陷入“双重合法性”^⑥的困境,甚至还将威胁全球安全。^④

另一方面,国家建构可以推进国家政治制度体系走向现代化,包括国家领土与主权边界的确立,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建构与完善等。其一,民族国家的权力基础在于对其领土的控制。“国家通过对土地的独立主权发挥作用”,而经由国家建构划定的国家实体边界,则形成了民族国家的“领土走廊”^⑤;其二,国家建构通过增强政府的行政、财政和制度能力等,实现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如福山所言,“国家建构是指建立新的政府制度以及加强现有政府”^⑥;其三,国家建构通过提供安全保障与制度保障,促进民众对国家的政治性认同。显然,此举可以巩固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根基。

2. 民族建构: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内核的建构

民族建构的目标是将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类群体整合为统一的国家民族,并强化民族成员的身份归

属感与国家认同感,进而巩固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根基。在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族群(ethnic groups)在神话历史、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及其利益诉求的分殊,导致族际之间、少数民族与国家民族之间存在张力,这种张力不利于培育民族国家内部成员的国家民族归属感。因此,需要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建构方式^⑦来消解这种张力并形塑国家民族。而通过民族建构形成的国家民族则充当过渡的“桥梁”,将原本囿于族裔身份的认同转移到与国家疆域相重叠的民族(state-nation)身份认同中来。这种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是指向民族国家的,是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力量之源。

民族建构的追求形塑一个与国家政治边界相重叠的国家民族共同体。而为实现这一点,还需在民族国家的主导下进行国家民族的观念塑造。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国家民族的观念塑造,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构成了民族建构的两个主要组成方面。有研究指出,蕴含各民族共有情感与想象的神话传说并非“冷静”的历史叙事,而是一种“选择性”的历史与理想化的混合物,是一种“政治神话”^⑧。民族建构正是在构成国家民族的各族裔文化基础上,在民族国家力量的主导下,促使国家内部的人们形成超越狭隘族裔认同的国家民族认同的过程。

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一体两面、相互依托。国家建构为民族建构提供稳定的政治屋顶和民主制度体系的保障,民族建构则将政治屋顶之下的国家内部成员形塑成统一的国家民族共同体。在两者的合力作用之下,最终达成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使民族国家拥有自身存在的权威性和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同时,也是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之下,现代民族国家才可“神形兼备”,既拥有民族国家的外观与形式,又拥有内部成员的凝聚力与政治认同。

五、关于现代民族国家前途问题的思考

通过前文对于三个关键因素的梳理与阐释,可

以发现无论是全球化、国家认同抑或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它们均会辐射到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对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且全面深刻的。基于前文的分析框架与学理讨论,可以做出关于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初步思考。

(一)全球化、国家认同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内在关系

三个关键因素作为重要变量不仅直接影响民族国家前途命运,还会形成以“国家认同”这一变量为核心的相互影响机制——全球化会消解国家认同,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保有和增进国家认同来展开的。

一方面,全球化使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动摇民族国家内部人们的国家认同。那么,全球化是否会成为打破民族国家这一范式的决定性力量呢?综合来看,跨国公司的存在和经营都要受到所在国法律、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约束或限制,同时民族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充当着本国经济保护者的角色;以欧盟为代表的超国家层面的政治团体,其核心要义仍然是为本国民众谋福利,这一点在欧洲疫情肆虐时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保护本民族(state-nation)文化则是民族国家的应有之义。可以发现,全球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消解国家认同,但仅凭全球化的冲击似乎难以打破民族国家这一国家范式。有学者指出,“只有伴之以民族国家内部国家治理的失败,才会真正引发解构民族国家的实质后果”^⑧。这里的“内部国家治理”亦即现代民族国家建构。

另一方面,作为影响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应对方案,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任务是在全球化日益纷繁复杂的背景下,通过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来促使民族国家获得国内不同民族的认同,从而有效应对内外挑战,使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形态得以存续发展。如果国家认同遭到过分削弱,民族国家也会面

临分裂的威胁,这就要求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应以国家认同作为最终目标导向,探索多种方式和手段来强化国内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作为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根基,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汲取认同的“养料”。同时,国家认同又成为推动这一建构进程的重要力量,以此应对来自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国家认同落脚于一种情感与行为倾向,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正如有些学者所提到的,“同一种情感可以用非常不同的方式去解读,并被引导达到完全不同的目的”^⑨。因此,如果国家认同以某种不恰当的方式被过分强调,则可能导致排外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这种情况会使民族国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受到挑战,对国际合作和交流产生负面影响,不仅阻碍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也会对民族国家自身的存续造成负面影响。

通过三个关键因素的关系梳理可以发现,国家认同在全球化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既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动力与目标,也是民族国家在遭遇全球化挑战时需要系统评估、慎重对待的核心问题。同时,虽然三个关键因素都在影响现代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但它们的作用方向和性质是不同的。整体而言,全球化是破坏性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是建设性的,而无论是破坏的程度还是建设的成效,衡量与判断的核心指标是国家认同。

(二)影响当前阶段民族国家建构的外部环境

民族国家作为当前国际关系舞台上的基本行动单元,其前途命运并非一路坦途,而是充满危机与挑战。如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退潮,作为主观情感与行为倾向的国家认同的脆弱性、敏感性与不确定性,作为“慢变量”^⑩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能否持续助力于国内多民族对于国家的统一认同,这些都构成影响现代民族国家存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第一,从全球化的维度观察,后疫情时代的全球

化给现代民族国家带来的“正外部性”在逐渐消失。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转向主要有两种争论,“一种是全球化将导致全球政治秩序的紊乱与崩溃,另一种是现有的国际秩序基本原则不会改变,但政治极化加剧,国际竞争将会取代国际合作”^⑤。前一种转向一旦发生,会直接撕裂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国际政治体系,但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了疫情带来的消极影响,有些危言耸听;后一种转向的支持者则认为疫情暴露了全球化所导致的国际分工的脆弱性,因而要退回保守主义、孤立主义阵营。比较而言,这种转向更接近于事实描述。而无论是哪一种转向,都势必影响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合作,加剧民族国家之间及其内部各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与冲突,进而引发地缘政治危机与民粹主义浪潮。全球化“正外部性”的消失,会给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蒙上阴影。

第二,从国家认同的维度观察,作为民族国家之间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认同边界,国家认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认同强度与持续时间也在发生变化,充满不确定性。一方面,全球化通过打破民族国家对政治权威的垄断以及在次国家行为主体之间建立联系,造成了对于民族国家认同的消解;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是“民族”和“国家”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本质属性就决定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存在张力,在国家认同建构中如果不能恰当处理两者的关系,就会对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造成影响。简单来说,民族国家若想维护国家认同,既要防止来自超国家行为主体的认同消解,又要抵御次国家行为主体的认同争夺。

第三,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维度观察,它是影响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内生性、建设性变量,同时也是“慢变量”,因此它的作用发挥难免出现“真空期”,产生“时空差序”^⑥的问题。在时间场域中,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并不总是同步,民族建构需要在充分回应各民族利益诉求基础上实现一种高于族裔认同的国家认同。而在不同阶段,国内各民族的利益诉求

本身也在持续发生嬗变,因此相较于国家建构,民族建构的难度更大且需要更多的时间;在空间场域中,国际移民的涌入,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行为主体的渗透会打破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边界与主权边界,从而让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及其成效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更大的不确定性。

(三)面向未来的民族国家行动方案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尽管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类型所具有的普遍优势似乎还未被动摇,但若想维系这一政治组织结构的存续发展,仍需做出积极探索和努力。第一,在经济方面,民族国家既要抓住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又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及转型。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民族国家应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积极引领或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使自身适应全球经济新格局。同时,民族国家还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全球气候治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数字经济治理”“绿色金融”^⑦等新兴领域寻求国际合作。此外,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要“利用疫情产生的倒逼和警示机制,实施更大力度的创新驱动战略”^⑧,找出自身的比较优势,主动谋求和占据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持续提升本国在全球经贸活动中的影响力。

第二,在政治方面,民族国家应围绕主权和领土来对“边界”进行多维重塑,实行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导致的“非法贸易”^⑨、领土争端、国家不稳定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挑战了国家对于边界的控制及对边界管控的传统理解^⑩,进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家认同。对此,可以采取以下应对措施:其一,加强脆弱性及不稳定性民族国家的边境管控。虽然边境壁垒会对跨国贸易产生影响,但其同时可能降低跨国恐怖主义和叛乱^⑪;其二,促使边界线与边界功能脱钩。有学者指出,“边界线应是对流动性的干预”^⑫,因此,通过“第三方国家参与”^⑬(边界管控外部化)和“创建宪法权力有限的内部区

域”(边界管控内部化)等方式,可以在实质上加强国家对于边界的控制;其三,发展智能边界。民族国家之间可通过交换数据库检查条目的方式来加强对“危险人物”的控制。^⑥此外,在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应制定并践行更符合自身定位的外交政策。民族国家不仅需要来自国内民众的认同,还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以此维系和提升国家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第三,在文化方面,民族国家应从民族文化基因中挖掘国家认同的养料,抵御文化全球化乃至文化帝国主义带来的侵扰。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国家要对每个国内民族的语言文字、神话历史、文化习俗等予以承认与保护。在赋予民族国家内部成员以平等权利的同时,也要认可、保护其特殊的差异性文化身份。要从国家民族的共有文化中汲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力量,但还应注意“尊重民族差异而不强化差异,保持民族特性而不强化特性”^⑦。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性威胁时,民族国家应秉持“和而不同”理念,保持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间距”,因为“文化间距之间的张力恰恰成为一种推动力”^⑧。此外,在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探索不同文化之间平等交流对话的常态机制,也是增进文化互信,抵御文化入侵的重要途径。

六、结论与讨论

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受到三个关键因素的影响,分别是全球化、国家认同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化在呈现新特点、展现其更多复杂特性的同时,也造成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加剧。“全球价值链”侵蚀国家主权、非国家行为主体带来国家合法性危机、“文化全球化”冲击国家本土文化等问题还在延续,这些现实表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正外部性”正在消失,民族国家面临的合法性挑战依然严峻;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存续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根基,对维护民族国家稳定与发展,以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无论从认同强度还是认同层次

上看,国家认同自身依然存在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系统评估、慎重对待,以避免因由国家认同缺失所导致的民族国家存续合法性危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包含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两个不同面向,两者共同构成民族国家保有自身存续发展的应对方案。但是从性质上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也不是灵丹妙药,而是作为“慢变量”存在的,还面临自身的“真空期”与“时空差序”等问题,一旦建构成效不尽如人意,也会导致走向失败国家或脆弱国家的结果。还要看到,这三个关键因素并非“各自为战”地影响着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是存在这样一种学理性的理想逻辑进路: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全球化是外部性、破坏性的自变量,冲击民族国家业已形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动摇国家认同这一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根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是内部性、建设性的自变量,民族国家通过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来回应全球化的挑战,以保有和维系国家认同,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国家认同则是因变量,在全球化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合力作用之下,发生或增强或衰弱的变化,进而左右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

民族国家仍是当今世界占据主流的国家形态类型和政治结构范式,这一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不会改变。同时,要想巩固民族国家的存续合法性,实现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就需要进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可以在以下三个领域着力推进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在经济领域,既要“化危为机”,抓住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又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及转型;在政治领域,要围绕国家主权和领土来对“边界”进行多维重塑,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在文化领域,要努力从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中挖掘国家认同的养料,抵御文化全球化乃至文化帝国主义带来的侵扰,防止发生颜色革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可以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国方案。该

方案是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不断迈向成功的经验基础上,结合“两个大局”^④提出的系统化、整体性、中国式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方案。该方案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密不可分,和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与全体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与拥护密不可分,也和全球化时代现代民族国家双重建构中的民族建构底层逻辑密不可分。作为该方案中的民族主体,中华民族既不同于同质性的早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也不是作为“想象的共同体”而出现在南北美洲、东南亚地区和非洲的国家民族,而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兼具内生性与实体性、拥有“多元一体”内部结构的国家民族。难能可贵的是,中华民族不仅在进入现代国际体系之后仍然保有鲜活生命力,而且更以一种整合的姿态、以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⑤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此相对比,“欧洲分裂成诸多民族/国家,即便在民族国家内部,也存在着难以统合的因素”^⑥;依托“一国一族”原则构建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国家内部,同样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张力。由此,作为中国式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方案的重要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有明显的进步性,既在应对当前阶段全球化的外部冲击与挑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又对保有和增进国家认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价值。

总之,现代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与自身的持续性建构能力及其成效密不可分,也与外部世界的环境变迁及其剧烈程度息息相关,在偶然与必然、个性与共性、时间与空间的交互作用之下,展现其丰富可能性。本文的讨论权当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同仁能就现代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一重要议题展开持续深入地研究、不断贡献学术增量。

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注释:

① L. D. Terry, "The Thinning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in the Hollow State",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vol. 37, no. 4, 2005, pp. 426—444.

② 本文将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视为“当前阶段”的起点。——笔者注

③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④ Michael A. Witt, "De-globalization: Theories, Predicti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50, no. 7, 2019, pp. 1053—1077. 许鹏:《脱钩:去依附战略与“逆全球化”思潮之辨》,载《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2期。

⑤ D. Rodrik, A. Subramanian, "Why Did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Disappoint?", *IMF STAFF PAPERS*, vol. 56, no. 1, 2009, pp. 112—138. 张礼卿:《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的退潮?》,载《世界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

⑥ Romain Lecler, "What Makes Globalization Really New? Sociological Views on Our Current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4, no. 3, 2019, pp. 355—373. 薛晓源:《数字全球化与新型全球化》,载《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⑦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全球流动:世界互联互通的纽带》, <https://www.mckinsey.com.cn/>, 2023年8月7日。

⑧ Theodore Levitt, "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61, no. 3, 1983.

⑨ Romain Lecler, "What Makes Globalization Really New? Sociological Views on our Current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4, no. 3, 2019, pp. 355—373.

⑩ 葛浩阳:《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何以交替并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载《世界经济研究》,2023年第6期。

⑪ 高放:《全球化的历史演变与当今态势》,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5期。

⑫ 郭忠华、张玉昆:《数字全球化:转型、动力与后果》,载《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⑬ Romain Lecler, "What Makes Globalization Really New? Sociological Views on our Current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4, no. 3, 2019, p. 363.

⑭ M. Jakob, "Globaliz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State of Knowledge, Emerging Issu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Climate Change, vol. 13, no. 4, 2022, p. 8.

⑮J.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Pandemic and Trump",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 43, no. 4, 2021, p. 795.

⑯J.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Pandemic and Trump",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 43, no. 4, 2021, p. 803.

⑰M. Lockwood, "Right-wing Populism and the Climate Change Agenda: Exploring the Linkage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27, no. 4, 2018, p. 11.

⑱M. Regev, "Postlude: World Culture after Cultural Globalization", *Poetics*, vol. 75, no. S1, 2019, p. 1.

⑲M. Regev, "Postlude: World Culture after Cultural Globalization", *Poetics*, vol. 75, no. S1, 2019, p. 3.

⑳A. E. Maynard, N. Chaudhary, "Human Development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 Towards a More Inclusive Future", *Human Development*, vol. 64, 2021, p. 251.

㉑[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小G. 宾厄姆·鲍威尔著, 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东方出版社, 2007年, 第34-36页。

㉒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新华出版社, 2005年, 第8-11页。

㉓R. Jaspal, B. C. da Silva Lopes and G. M. Breakwell,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National Identities*, vol. 23, no. 5, 2021, pp. 455-472.

㉔杨晗旭、常乐:《后殖民认知偏见与港人国家认同建构》, 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5期。

㉕参见袁明旭、左瑞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政策的国家认同建构功能研究》, 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2期。

㉖石亚洲、张方译:《多民族国家建构国家认同的关键维度与政策路径》, 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4期。

㉗杨素文:《全球化语境下国家认同危机及其解决路径研究:评〈国家认同建构:基于民族视角的考察〉》, 载《科学决

策》, 2021年第6期。

㉘S. W. Goodman, "Liberal Democracy, National Identity Boundaries, and Populist Entry Points", *Critical Review*, vol. 31, 2019, p. 378.

㉙S. W. Goodman, "Liberal Democracy, National Identity Boundaries, and Populist Entry Points", *Critical Review*, vol. 31, 2019, p. 380.

㉚高景柱:《国家认同的危机与构建:基于正义制度的分析》, 载《学术界》, 2021年第8期, 第54页。

㉛"First Skirts, Now Paintings: Dior Faces More Copycat Accusations in China", *Jing Daily*, <https://jingdaily.com/dior-cultural-appropriation-china-paintings-skirts/>.

㉜参见于春洋:《比较视野中的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年, 第139-151页。

㉝E. Lindstam, M. Mader, and H. Schoen,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Ambivalence towards Immigr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1, no. 1, 2021, p. 93.

㉞F. Fukuyama, "Why National Identity Matter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9, no. 4, 2018, p. 10.

㉟穆军全:《由教化到濡化:意识形态工作的现代治理转向》, 载《长白学刊》, 2020年第5期。

㊱F. Fukuyama, "Why National Identity Matter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9, no. 4, 2018, p. 10.

㊲F. Fukuyama, "Why National Identity Matter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9, no. 4, 2018, p. 9.

㊳D. Hammett, L. Jackson, "The New Age of the Nation State?", *Geography*, vol. 106, no. 2, 2021, p. 78.

㊴陈心香、叶麒麟:《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国逻辑》, 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1期。

㊵杨文帅:《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时空差序问题》, 载《浙江学刊》, 2022年第4期。

㊶参见于春洋:《外观与内核:论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建构》, 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

㊷V. Boege, A. Brown, K. Clements and A. Nolan, "On Hybrid Political Orders and Emerging States: State 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Fragility", Berlin: Berghof Research Centre for Constructive Conflict Management, 2008, p. 3.

④3 B. R. Rubin, "Peace Building and State-building in Afghanistan: Constructing Sovereignty for Whose Securi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7, no. 1, 2006, p. 183.

④4 M. Miklaucic, "State-Building 101: Hard Lessons from Afghanistan",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49, no. 4, 2022.

④5 D. Hammett, L. Jackson, "The New Age of the Nation State?", *Geography*, vol. 106, 2021, p. 79.

④6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 郭华译:《国家建构: 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上海三联书店, 2020年, 初版序言第1页。

④7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 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第168-175页。

④8 [美] 安东尼·史密斯著, 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 第72页。

④9 王卓君、何华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 危机与重构》, 载《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9期。

⑤0 S. Merrill, S. Sumartojo, A. C. Stephens and M. Coward, "Togetherness after Terror: The More or Less Digital Commemorative Public Atmospheres of the Manchester Arena Bombing's First Anniversar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38, no. 3, 2020, p. 17.

⑤1 有关“慢变量”的最初讨论来自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谢谢你迟到——以慢制胜, 破题未来格局》(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可以把慢变量理解为导致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和深层原因, 使其发挥作用也需要一个培育和成长的过程。——笔者注

⑤2 K. R. McNamara, A. L. Newman, "The Big Reveal: COVID-19 and Globalization's Great Transform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4, no. S1, 2020, p. E59.

⑤3 杨文帅:《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时空差序问题》, 载《浙江学刊》, 2022年第4期。

⑤4 参见赵蓓文:《制度型开放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政策实践》, 载《世界经济研究》, 2021年第5期。

⑤5 戴翔:《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中国机遇及对策》, 载《经济纵横》, 2020年第6期。

⑤6 B. A. Simmons, "Border Rul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1, no. 2, 2019, pp. 256-283.

⑤7 Fabian Gölzau, Steffen Mau and Kristina Korte, "Borders as Places of Control: Fixing, Shifting and Reinventing State Borders. An Introduction",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vol. 46, no. 3, 2021, pp. 7-22.

⑤8 N. Avdan, C. F. Gelpi, "Do 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 Border Barriers and the Transnational Flow of Terrorist Viol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1, no. 1, 2017, p. 12.

⑤9 N. Avdan, C. F. Gelpi, "Do 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 Border Barriers and the Transnational Flow of Terrorist Viol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1, no. 1, 2017, p. 2.

⑥0 "Denmark Passes Law to Move Asylum Centers outside the EU.",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jun/03/denmark-passes-law-to-let-it-relocate-asylum-seekers-outside-europe>.

⑥1 Nina Amelung, Helena Machado, "Bio-bordering Processes in the EU: De-bordering and Re-bordering along Transnational Systems of Biometric Database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gration and Border Studies*, vol. 5, no. 4, 2019, pp. 392-408.

⑥2 梁爱文:《国外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举措与镜鉴》, 载《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0年第5期。

⑥3 吴攸:《全球化、中西对话与可理解的共同体——论弗朗索瓦·于连的〈论普世〉》, 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2期。

⑥4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 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参见《习近平总书记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微镜头》, 载《人民日报》, 2019年5月23日。此后, “两个大局”思想多次出现在党和国家重要政策文件之中。

⑥5 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载《人民日报》, 2023年6月3日, 第1版。

⑥6 陈贇:《多元一体: 古典思想视域下中华民族的立身基础》, 载《探索与争鸣》, 2023年第4期。